

選自翻譯者（續）：《使徒》

作者：賴香吟

第五小節

〈柏林天空下〉

柏林天空下。後來這些年裡，夏先生又聽見人們談起這部片子，多數是年輕人，比過去的自己更年少，不過，他們的口氣裡似乎帶著過多的崇敬。崇敬是不必要的，崇敬顯示了他們與作品的距離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也確實有點距離了，不是嗎？夏先生自己問自己。

在他心中，若問什麼叫做經典？藝術作品有什麼值得回顧的理由？某些創作於特定當下的作品，倘若沒有被後來的時光刷淡，還足以留下來持續被閱讀、被討論，總該有些理由。比較簡單的可能是因為有話題性，或有材料價值。比較複雜的理由呢，也許是關於體驗與信念：某些作品深受喜愛，必然因為它打動人心裡面的什麼，若是再跨越時空，持續性地被回顧，想必是它抓到了普遍性的什麼，或者作為人之必然永恆存在的什麼——

夏先生感覺到自己的腦袋又造出了太長句子，這類問題，他總沒法說得簡單俐落明白。時間過去，不同的人在眼前來來去去，他漸漸明白了，藝術終歸是體驗的問題。當然，有些體驗不是人人都有，也並非人人需要體驗，幸福的人生是不需要太多體驗的，不，沒有體驗的人生是幸福的嗎？夏先生再度停了下來。

幸福這個問題太難回答，多少作家，多少故事，都在寫這個題目，但那真正的意義是在於展示這題目，而不是解答。回到體驗吧，夏先生拷問自己很多年了，體驗，絕非出於階級的問題，而是心的問題（當然，階級也決定了心，這是可哀的，以他的世代，以他在這人世間的位置，他怎麼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，可那是另一個題目：關於心靈如何不受階級囚禁，心在階級裡各式各樣創傷的故事……）

（啊，夏先生發出了一聲嘆息，如此蔓延下去，思緒是不會停止的，人世間種種現象本來就是環環相扣，因果相生，他得停下來，倘若無法在適當處、關鍵處停下來，他何有資格稱為一個作家呢……）

回到心的問題吧，如同音樂的奧秘，不是人人需要聽到細節，音樂也還是存在著的，愉悅，裝飾，消費，教學，或被盲目地推崇著，直到哪時哪刻，哪個心靈帶著屬於他/她自己的故事，忽然間打開了自己的心，便聽見了真正的音樂——

在這一連串宛如植物生長，枝繁葉茂岔出去的聯想之後，夏先生回神過來聽

見了車廂裡的音樂，有點耳熟，華格納？Tristan und Isolde 序曲？

這位來接他們的陳秘書，應該是為了禮貌，既不好隨意攀談，又想避免無話可談的尷尬，特意在車內留著低音量的音樂。廂型車奔馳於高速公路，夏先生望著窗外微微陰鬱天色，重新調整自己的時間，午後兩三點，倘若在似乎總是冒著熱氣的島嶼，這種時間聽 Tristan und Isolde 的序曲，應該會讓很多人昏昏欲睡，可是，現在，他卻聽得刺激，即使是在微微聽見引擎聲的現在，他竟還是被那些在島嶼午夜才可能浮出來的，過長的休止符，扼住了頸子——

懸絲偶般，拉緊了情緒的，空無，在休止符裡，什麼聲音都沒有。

那是孤獨？哀傷？還是詭異？樂句一波一波，很多半音，不對勁，不和諧，然後有什麼細細萌芽，慢慢攀高，如浪生湧，終而向你湧來，將你淹沒。

樂曲結束。夏先生調整思緒，聽見幾句德文說了什麼，然後，換上李斯特的 Liebestraum，是完全不同的曲風了。

「這是專播古典音樂的電台嗎？」夏先生問。

「是啊，跟我們的臺北愛樂有點像，也有專播爵士樂的。」陳秘書回答。

李斯特流動的鋼琴將窗外天色又帶往另一種回憶，夏先生經常覺得，音樂還是有音樂的來處，就像社會現象有其文化背景，這些西方音樂實在適合在這寒冷陰鬱的北國，無論是創作或聆聽，都帶來平靜，也帶來安慰與啟示吧。

車廂內的他們開始簡單攀談，大抵因為車速很快因而聊到此地沒有時速限制，也談談這兒的上班下班、駐外津貼、子女就業等民生話題。夏先生不曾來過此地，可不曉得為什麼窗外樹木生長的形狀，讓他感覺熟悉。他在記憶裡搜尋這種熟悉感從何而來，可能是好多年前去捷克，公路兩旁那些泥土與樹林，有點類似。

「有可能，捷克離這兒不遠，就算搭火車，十個小時應該到得了。」陳秘書說。

捷克。中歐。東歐。這兒仍是歐洲，不過，景致看起來與英國、法國截然不同，就算與德國西部相比，也有許多不一樣。在過去，這兒是東德的國度，只有那麼一小塊區域，屬於西德，那是號稱民主的西柏林。孤島，原來共產不是孤島，民主才是孤島。教育到底是怎麼教的？冷戰把世界切成兩半，半個世界的人無知於另外半個世界。無知。夏先生把思緒轉回來。〈柏林天空下〉，自己看這部片的時間，也真是夠無知了。

夏先生望著窗外灰沈沈的天色，確實有幾分那部片開場的悵鬱，同樣的高速公路，望出去那些窗子裡的生活，現在，想必不一樣了吧。不，可能也還是差不多，人的生活根本不會有太大變化。黑白兩色的疲憊，抱怨，做夢，孩童的天真，天真的孩童之眼，與天使疑惑對望，偷偷微笑，而後一日一日長成大人，失去了與天使的關聯。

那是二十年幾前的事了。朋友謝君借給他的光碟片，只有德文發音，連英

文字幕也沒有。剛解嚴的時代多少還緊縮著，即使語焉不詳，他仍然勉力看了。彼時他與清一宴請剛從美國回台的謝君吃飯，從天安門事件聊到了東西德正在討論如何進行統一。他與清一對這個話題有點陌生，畢竟歐洲很遠，東德資訊更幾乎是完全被封鎖的。那一兩年，對他們這種過了將近三十年封閉歲月的人來說，世界彷彿驚天動地在變，先是台灣自己準備解嚴，再來是戈巴契夫一連串動作，到了忽然釀高的天安門，簡直讓他們得壓著胸口的心跳，才能冷靜目睹時代的變化。然而，從春天到秋末，一連串的騷動以讓人失望卻不意外的清場行動作結，夏先生或是在那時，宛如一團小小的火被澆熄了似地，沒再那般熱切關注世界的變化。

柏林圍牆倒塌，是在那之後不久接續而來的事。太突然了，別說世界，恐怕連柏林境內都未必抓準這變化。謝君同他們說起同樣處在騷動之中的東歐局勢，回首望去，才懂發覺天安門事件恐怕亦是這一連串骨牌效應裡的一張牌，只不過，這張牌沒倒就是了。

謝君屬於夏先生同世代那些久別的朋友們，長年旅居國外的緣故，對世界比他們多了幾分地理上的優勢。謝君說起就在圍牆倒塌前不久，因為工作有機會去了一趟柏林。「奇怪，太奇怪了。」謝君以誇張的口吻向他們描述東西分治下的柏林：「那不過是一人半高的水泥牆，只消你拿起古早務農的圓鋤，就可將之敲出洞來，要不，從下方挖出條地道也行，你們說，在童話故事裡，這不是連老鼠都做得到的事嗎？」

柏林圍牆給了長年不得歸台的謝君許多感觸。它如此之近，如此之矮，攀爬不是問題，問題是在週邊來自人為分秒不懈的防守：死亡地帶。政治替世界劃了盡頭，不是高牆擋住你的去路，而是人心規定你，嚇阻你。謝君不斷以「荒謬」二字形容之，夏先生與清一自然是懂得的。在台灣，即使沒有「圍牆」二字，卻有「鐵幕」二字作為他們成長的背景詞。如謝君這樣的朋友，更是因著政治觀點的歧異，被放逐於家國之外。對他們這一代人來說，隔闕世界的是人的心，而不是地理相隔多遠，多遠的機票都能買，就唯獨那小小的家鄉不能歸去。

謝君是在那趟柏林行買下了溫德斯的〈柏林天空下〉。

「你們一定要看看。」謝君說：「恐怕連導演自己也想未到，只有天使才能穿越的圍牆，竟然在幾年後倒了。」

「我們也是沒想到，你總算回來了。」清一這麼說。

「我是運氣好，講起來，我實在也沒什麼。」謝君說：「問題是還有真多人沒法度回來。」

「你以前提過的，紐約的郭松棻君，可有回來的打算？」夏先生想起這個和自己同代的寫作者。

「應該是有吧。我這幾年跟他聯絡少了。他若有想法，應該可以設法。」

謝君想想又說：「舊年，不是聽講陪他爸爸回來台北開畫展？」

「是嗎？」夏先生顯得有點懊惱：「我竟然沒注意到。」

夏先生之所以識得郭君，說起來，並非文學的緣故，而是因為與謝君早年通信。那時的郭君被介紹為保釣健將、一個有思想高度的朋友，而非是與文學有多大關係的人士。

然而，幾年前，在副刊讀到郭君的小說〈月印〉，日語與五四白話文的揉和，帶著詩意寫了昔日台灣生活情調，夏先生被深深地打動了，心裡如同回到 70 年代捧讀報紙那般感到充實、被撫慰。

謝君接而與他們談起了郭父，說晚年定居美國的郭雪湖，依然規律作畫，細緻的彩膠筆觸依然還有故鄉。「〈月印〉寫得全是故鄉的美。」夏先生忍不住說：「講起來，親像他爸爸的畫。」

「畫圖，作品可以得到欣賞，不過，文學——」謝君說到這兒，停了停，宛若陷入過往信裡的感觸：「文學，有語言的問題，在海外，總是一件寂寞的代誌。」

謝君的感觸或許關乎他本身。他亦是於保釣運動浪擲了激情的時代一人。從最初帶著面具上街抗議示威釣魚島事件，到後來終於拋開了面具，於光天化日下說出自己的意見。那是美麗島事件的催化，政權想要藉此警戒、規訓人心，卻反彈了更激憤的人心。「我走出來了。」謝君當年的信這樣寫，他也在那封信後，被列進了黑名單，人生黃金時光，無法再回返這個島嶼。小小的文學的燭火，在後來的歲月裡滅了。「文學是那樣一件寂寞的事呀。」好些年，謝君重複地說這句話，說自己畢竟不是內靜之人，旅居地又是那樣冰天雪地，與其伏案獨語，不如承認他多麼需要朋友的回饋與溫情。

夏先生理解地敬他一杯酒，語言與創作的孤獨，他是深深明瞭的。謝君提到自己對文學的殘熱，倒是移轉到了語言本身。除了原本就利索的英、日文，後來歲月他還自修了義大利文與德文，這倒使他成為優秀的貿易商了。

夏先生即是從那一晚，受了謝君大大的推薦，即使不懂德文，仍然勉力把〈柏林天空下〉給看完。後來，很多時間過去，台灣解嚴之後的變化也非常快。他一直沒有機會再跟謝君談起這部片子，倒是因為記得謝君說過這部片子諸多文詞出自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克(Peter Handke)的手筆，曾經特別在書店裡翻了少數可得的中文譯作，但他倒是不曾起心動念去找有中文字幕的版本再看一次，儘管日後光碟變得如此容易取得。他就把〈柏林天空下〉給忘了，如同忘記其他很多瑣瑣碎碎的小事一般。

可是，說也奇怪，當他接到承辦這次活動的出版社，提起柏林，第一個浮上腦際的印象，卻是這部片子。

他竟然還記得那個黑白陰沈的城市，垂著臉立於塔尖的天使，空曠的街道，奇異的圍牆，屬於過去但也和他同年代的芸芸眾生，即使他可能根本沒有看懂那

是個什麼樣的故事，可他記得那片子似乎有著什麼晦澀而永恆的感覺，以及更多隱含著孤獨、苦悶、渴望與絕望的畫面。

「柏林這個城市正在重建，大家都很關注。」與他相熟的編輯鼓舞著說：「夏先生，很值得去看看喔。」

他也想起了謝君。「奇怪，太奇怪了。」言猶在耳。年輕的他們比較容易大驚小怪嗎？不，那時，他們已屆知天命之年，不年輕了，但人類種種行止仍然叫他們感到詫異而悲哀，是文學讓他們過份纖細，還是他們視野過份狹隘？落葉歸根的謝君，在發完好一陣政治熱病之後，轉去宜蘭養病蒔花，連臺北也不太來了。

夏先生是從那部片接上了柏林，一旦接上才發現自己知道的柏林已經很久不在了。清一在世，懊惱去過慕尼黑也去過法蘭克福，就是沒機會走一趟柏林。「柏林是中歐的心呀。」讀了半生歷史的清一這麼評論：「從歷史看，從地理看，左邊、右邊，畫個十字，你看，這不都是心臟嗎？」

左邊、右邊，畫個十字。清一講的是經濟，是宗教，可他現在已經去做天使了，他也會穿一襲黑衣，長長地，悶著臉，杵在那金黃色的勝利女神柱上？不，他應該比較喜歡在人間四處走，對那些娃娃車裡的小孩扮鬼臉吧……

陳秘書把車停下。眼前是一扇半人高的白色柵欄。

夏先生把思緒拉回來，環顧周遭，門內的庭院中心是棟別墅建築，有點歷史痕跡了，兩側另有較小屋舍，草地上零星停著幾輛車，午後的寧靜裡，有幾株參天大樹。

簡單的迎接與介紹之後，陳秘書標準程序般領著他們找房間、安頓行李、介紹房內設備，然後詢問是否需要帶他們認識附近出入車站，買交通月票等等。

「我去就好。」女兒茉莉體貼地說：「爸爸需要休息吧？」

門扉關上，茉莉與陳秘書踩著木樓梯一階一階走遠了。然後，塵埃落地似地，一股寧靜襲來。是的，襲來。台灣太吵，聽覺已經習慣有雜音的環境，忽然之間，沒了車聲、人聲、樂聲、工程雜音，反而被寧靜驚嚇到了。夏先生深吸口氣，再把聽覺拉緊，是的，連一般屋內籠罩著的電腦、電視、電冰箱的電流雜音都沒有。

夏先生在窗前的桌椅坐下來，品茶般專心感受著寧靜，偶有一兩聲鳥鳴，可能是窗外哪株樹上傳來的。

長途飛行的疲憊逐漸泛溢出來，夏先生感覺早年行萬里路的志向，似乎慢慢投降於身體的老化，走馬看花是早就厭倦了，就連工作或探訪舊友的旅程，這些年也愈減愈少，老年是不適合流浪的吧，夏先生想起托爾斯泰晚年最後出走，竟然就那樣客死於旅途中的火車站。

夏先生笑了笑自己，有女兒茉莉陪他一起來，他該感覺到很幸福，何況這是一個像走失了路而又回到身邊的女兒。柏林，也是值得一來。年近四十的托爾斯泰，在這城市，寫成了『尼基塔的童年』，純真的眼睛，鮮活的世界，那恐怕是

托爾斯泰作家之路真正的起點。還有，卡夫卡，他終於在這兒過上了真正的生活，得了真正有愛的生命，雖然他的生命即將航向終點。還有，還有，他可以舉列出更多的作者，都曾經在這座城市留下足跡。「中歐之心」，心是多麼複雜的東西，有善有惡，有熱情有黑暗，至關重要卻也殘破不堪。啊，世界之大，他知之甚少。他懂事的時候，戰爭總算結束了，然而，有另外一些冰冷的、恐怖的什麼，困住了他們這一代……

人在歷史之中看不清楚，走到今天，來到此刻，夏先生望著這個城市，忽然懂了那個象徵——是啦，圍牆，原來就是圍牆，圍牆把他們都關成井底之蛙了。

他真正來到柏林，費了這麼久的人生。

世界之大，他如何能知之甚少。

夏先生脫了外衣，打開行李，把厚實擠壓著的書與文件抽出來，那是他在此地朗讀與演講會所需用到的資料。「要勞您對台灣文學做一些介紹與推廣喔。」承辦人員是這麼說的。

介紹與推廣？夏先生自愧年已至此，還能做到多少？台灣文學？要論承擔這個責任，還有許多人比他更有能耐，比如郭君，夏先生心中一慟，誰料到，如今，郭君竟已是不在了。

這麼多年來，他總還懷著能與郭君見上一面的心，不為什麼，只為表達對他的敬慕，或送上一份同代人的溫暖，感謝他把記憶與苦難寫得那麼美，可這竟是無機會的了。幾年前，郭君那樣令人措手不及地，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作為一名長期獨自生長的寫作者，夏先生對自己說明文學的能力並非那麼自信，他既非出身文學系所，又長期做著非關藝術的職業，文學之於他，與其是來自知識訓練，毋寧是點點滴滴的生活所煉成。雖說這也是一種根實的文學，可作為一個講演或出訪對象，夏先生想，若郭君還活著，那麼，由他那樣長期埋首於思想、文學的人，那樣一枝能把日本婦人離台之際的徐徐鞠躬形容為「比河邊的蘆葦還要柔弱」的文筆，加以對西方生活、語言的掌握，由他來展演一種台灣文學的存在，是再適當不過了。

窗外又響起幾聲清脆的鳥鳴，餘下便是深沈的寧靜，夏先生在床邊躺下來，懷念著作品裡他所讀過的郭君那縝密的思維，嚴格的美學，優雅的神態，慢慢地閉上了眼睛。